

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学生们列队行进在去临潼的路上,准备向蒋介石请愿。张学良闻讯,劝阻了学生。当晚,张学良向蒋介石传达了学生的要求。张学良对蒋介石苦谏道:“九一八事变爆发时,您宣布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,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。可现在,5年过去了。我们不能老是告诉人民,我们在准备。敌人正在每日不停地侵占我国的国土,我们不能再等了。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,必须明确择定。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,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。我感到领导全国团结抗日,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……”

“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?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?”蒋介石粗暴地打断张学良的话。正是在这一天,青年学生的群情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,给张学良以很大刺激。张学良坚定了实行兵谏,逼蒋抗日的决心。

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。故事变后,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,力求使西安军民、全国各界以至全世界人民了解到西安事变的真相,实现团结起来,维护和平,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根本目的。

张学良首先与中共取得联系。12日凌晨5时,张学良致电中共领袖毛泽东,称: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,不顾一切,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、朱绍良、蒋鼎文、卫立煌等扣留,迫其释放爱国分子,改组政府,兄等有何高见,速复……”其后,他又与杨虎城联名电邀中共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。

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,张学良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人,申明兵谏只为蒋介石接受抗日的要求。他说:“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,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。弟爱护介石,八年如一日,今不敢因私害公,暂请介公留住西安,促其反省,决不妄加危害。”他还致电国民党元老冯玉祥、邓宝珊、李烈钧等,请他们“躬亲来陕,开诚指示,共谋国是”;又派出代表分赴广西、山西、绥远、山东,向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阎锡山、傅作义、韩复榘等详细说明真相和目的,征求这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处理意见。此外,他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,说明:兵谏此举,无疑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,但权衡轻重,为了拯救国家危机,不得不如此。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,无利于国家民族的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,反过来我们一定要干!

张学良如是说,也如是做。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,他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,就继

续拥护他做抗日领袖。他的这一观点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不谋而合。正是从此观点出发,他致力于与南京派员们的和谈。后来,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帮助和有效斡旋下,张学良终于实现了逼蒋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心愿。

众所周知,张学良个人却遭到蒋介石的残酷报复。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,即12月27日,蒋介石就授意宋子文转告张学良,写出一个书面的“请罪书”。蒋介石先是以张学良手书的“请罪书”将张学良送上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,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,夺公权15年,后又装模作样,请求国民政府“特赦”张学良,交军事委员会“严加管束”,于是,对张学良的处罚就从10年有期徒刑变成了无期徒刑。

这一场“审张”、“赦张”又“管束”的丑剧,给了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。但对张学良而言,却是终其一生、长达半个世纪的监禁生涯。

主题词:军事历史 西安事变 [张学良]

西安事变中的杨虎城

吉林省延吉军分区 王法权

杨虎城,名彪号虎臣。西安事变前夕,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17路军总指挥。

与张学良联手对蒋介石采取兵谏行动,杨虎城决非一时意气所为,而是其成熟的政治和思想主张所致。早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深重的民族危机就激发了杨虎城心灵蕴藏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。1933年3月,闻知日军向热河进犯,杨虎城坐不住了。他一身戎装,气宇轩昂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,慷慨陈词,请缨抗战。

然而,杨虎城受到蒋介石的冷遇。

此后,愤于日军的疯狂侵略,杨虎城又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第17路军开赴抗日前线,为民族雪耻。但请战之电如石沉大海,毫无音讯。直到1935年元月,蒋介石才来了作战命令。不过,不是抗日的命令,而是围剿红军、打内战的命令。

尽管杨虎城并不情愿,却不得不遵军令,立即出兵,拦截由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地区转移的红25军。但是,杨虎城部遭到了红军沉重的打击:当月,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,杨虎城部6个营被红军歼灭;3月,在佛平、华

阳地区，警卫第2旅两个团被红军全歼。4月，警卫第3旅5个营被歼于秦岭山区袁家沟口。惨痛的失败，使杨虎城逐步领悟到内战“剿共”是自相残杀，没有前途的。他曾发自肺腑地说：“抗日，大家都有出路，打内战，大家同归于尽。”

后来，杨虎城在藏园别墅的客厅里与中共代表达成《红军与第17路军友好互不侵犯协定》，与红军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。在第17路军辖区内，红军人员只要换上第17路军军服，就可自由进出西安。红军还在西安设立了3个交通站，红军的军用品及其他各类物资由此运往陕北。

1936年12月8日，张学良哭诉失败后，杨虎城决定由自己出面，再作一次努力，向蒋介石进谏抗日主张。蒋介石竟也听不进杨虎城用词审慎的劝说。蒋介石反而叮嘱杨虎城说：“第17路军军官中，如有不愿‘剿共’而主张现在抗日的，要放手撤换。”蒋介石的话给用心良苦的杨虎城当头一棒。

杨虎城也对劝谏方式绝望了。于是，他与张学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逼蒋抗日的兵谏行动。

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目的与张学良是一致的。他决不愿杀蒋而引起内江。不过，在放蒋问题上，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几十年残酷的政治经验使他体会到，轻易放蒋，必定是放虎归山，张学良和他自己日后决然逃脱不了蒋介石的报复。何况他深感自己不能与张学良相比。尽管张学良是此次兵变的主谋，但张学良是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，并且在东北易帜、中原大战等重大事件中有大功于蒋介石。而自己不过是割据西北的地方军阀，是蒋介石长期以来翦除异己的对象。所以，杨虎城在表面上对张学良的宽宏大量不置可否，但他心中有数。按照杨虎城的预想，他的打算是长期扣蒋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直至全国抗日高涨局面出现。

起初，杨虎城将实现他的预想寄托给中国共产党。因为他断定以国共10年来的血海深仇而论，中共是绝对饶不了蒋介石的。但在与周恩来首次交流意见时，杨虎城感到大失所望。

他的幕僚们也坚持认为，不能轻易放蒋，释放蒋介石至少要其向全国作一次广播，改变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并签署协议，那怕是秘密的协议等等。当然，这些无疑都是言之有理的。但张学良、周恩来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出发，大局为重，他杨虎城和第17路军官兵又岂能计较个人得失？为此，杨虎城心乱如麻，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。一想到日后他与第17路军的前途，便忧心忡忡，食不甘味。

中共代表周恩来看出了他的犹豫，并针对他的疑虑，数度与之交谈，终于说服了杨虎城。杨虎城对周恩

来坦言：“兵谏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，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。这一点张学良和我是可以质天日而无愧的。”他还表示：“只要中华民族能够生存，我个人对为功为罪，是不计较的。”

周恩来对杨虎城服从大局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20年后，周恩来指出：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张、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。”

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，但返回南京后的蒋介石竟免却了杨虎城的官职。1937年3月初，蒋介石假以劝其出国，前往欧美考察军事之名，剥夺了杨虎城对第17路军的指挥权。杨虎城出国后，蒋介石下令对第17路军进行整编，将它缩编为1个军，下辖两个师，命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兼军长。

同年11月，远在异国他乡的杨虎城得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，毅然回国，打算率部抗日。出乎杨虎城意料的是，回国后，他即被拘禁，至1949年9月，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前，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杨虎城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。

杨虎城将军就这样去了，但他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却永留人间。

主题词：军事历史 西安事变 [杨虎城]

(本栏责任编辑 张晓彤)

简讯

“孙子故里”培训外国军官百余人。兵圣孙子故里山东省惠民县修建的“孙子故园”被国防大学定为外国军官学习《孙子兵法》培训基地。目前，已有孟加拉、玻利维亚、乌拉圭、厄瓜多尔等国的120名陆海空军军官分8批来此接受《孙子兵法》学习培训。(韩勇 宋金成)



图为外国军官在参观孙子圣绩图